

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

□ 戚良德

三十八年前的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青岛成立,《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23日以《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为题予以报道,其中有言:“近三十年来,我国出版了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二十八部,发表了论文600余篇,并形成了一支越来越大的研究队伍。”因而认为:“近三十年来,‘龙学’工作,无论校注译释和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至少从此开始,《文心雕龙》研究便有了“龙学”之称。如果说那时的二十八部著作和600余篇论文已经是“丰硕的成果”,那么自1983年至今的近四十年来,“龙学”可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据笔者统计,目前已出版“龙学”著作超过八百种,发表论文超过一万篇。然而,《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这一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在“龙学”颇具规模之后,显得尤为突出,需要我们予以认真回答。

如所周知,在《四库全书》中,《文心雕龙》被列入集部“诗文评”之首,以此经常为人所津津乐道。近代学者刘咸忻在其《文心雕龙阐述》中却指出:“彦和此篇,意笼百家,体实一子。故寄怀金石,欲振颓风。后世列诸诗文评,与宋、明杂说为伍,非其意也。”他认为,《文心雕龙》乃“意笼百家”的一部子书,将其归入“诗文评”,是不符合刘勰之意的。无独有偶,现代学术大家刘永济先生虽然把《文心雕龙》当作文学批评之书,但也认为其书性质乃属于子书。他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文心雕龙》为我国文学批评论文最早、最完备、最有系统之作,而又“超出诗文评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从中“可以推见彦和之学术思想”,因而“按其书之思维,名为一子,允无愧色”。此论更为具体而明确,可以说是对刘咸忻之说的进一步发挥。王更生先生则统一“诗文评”与子书之说,指出“《文心雕龙》是‘文评中之子书,子书中的文评’”,并认为这一认识“最能看出刘勰的全部人格,和《文心雕龙》的内容归属”(《重修增订文心雕龙导读》)。这一说法既照

《文心雕龙》论诗重实求真及其对叙事传统的贡献

□ 李翰

就词义的基本逻辑与大概而言,抒情与叙事,一偏于个体和主观,一偏于群体和客观,一向内指向心性情感,一向外指向社会群体。因此,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首先是诗歌在叙事中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如《诗》“六义”中的“观”“群”,诗教中的讽喻和规谏,诗与史的互文和互证,等等。与此相关,人们将诗看作严肃而崇高的文体,诗人不苟作,诗必征实,读诗须知人论世,等等。其次,诗歌叙事传统,又是在诗歌叙事中发展出的写作传统,或者说一种诗歌的叙述传统,包括抒情、说理诗的写作,都离不开叙述。

从这些方面来看,《文心雕龙》对诗的现实性、真实性的论述,对诗歌写作语言逻辑、层次结构上的叙事批评,等等,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认识,有必要略作挈发。

现实性是儒家诗学的根本,这一“现实性”,其精神就是重实求真,包含且大于今天所说的反映社会现实。抒情有“诗言志”,有“美刺”“比兴”,然抒情之“真”要与叙事、叙事相结合,方得以落实。《诗大序》阐释“诗言志”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接着便说“治世之音”“乱世之音”如何如何,就是将抒情、叙事合而论之。《文心雕龙·明诗》也以“诗言志”开篇,

顾了刘勰自己所谓“论文”的出发点,又体现了其“立德”“合道”的思想追求,应该说更加切合刘勰的著述初衷与《文心雕龙》的理论实质。不过,所谓“文评”与“子书”皆为传统之说,他们的相互包含毕竟只是一个略带艺术性的概括,并非准确的定义。

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更为合乎实际的说法呢?笔者以为,较之“诗文评”和子书说,明清一些学者的认识可能更为符合《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明人张之象论《文心雕龙》有曰:“至其扬榷古今,品藻得失,持独断以定群器,征往哲以觉来彦,盖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这里不仅指出其“意笼百家”的特点,更明白无误地肯定其创为新说之功,从而具有继往开来之用;所谓“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则具体地确定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那就是写作的章程和标准。清人黄叔琳延续了张之象的这一看法,论述更为具体:“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瑰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扶掖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所谓“艺苑之瑰宝”,与张之象的定位可谓一脉相承,都肯定了《文心雕龙》作为写作章程的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同时,黄叔琳还特别指出了刘勰“多所折衷”的思维方式及其对“文章利病,扶掖靡遗”的特点,从而认为《文心雕龙》乃“缀文之士”的“津逮”,舍此其书性质乃属于子书。他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文心雕龙》为“清代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这段话言简意赅,历来得到研究者的肯定,因而经常被引用。但笔者以为,章氏论述较为笼统,其中或有未必然者。从《诗品》和《文心雕龙》乃中国文论史上两部最早的专书(即所谓“成书”)而言,章学

诚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仅此于此而已。其“论诗”和“论文”的对比,是不准确的,所谓“《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这样的类比显示未搞清六朝“诗”“文”概念的泛泛之谈。《诗品》确为“论诗”之作,且所论只限于五言诗;而《文心雕龙》所论之“文”,却绝非与“诗”相对而言的“文”,乃是既包括“诗”也包括各种“文”在内的。即使《文心雕龙》中的《明诗》一篇,其论述范围也超出了五言诗,更遑论一部《文心雕龙》了。

与章学诚的论述相比,清人谭献《复堂日记》论《文心雕龙》可以说更为精准:“并世则《诗品》让能,后则《史通》失雉;文苑之学,寡二少双。”《诗品》“让能”者,《史通》之所以“失雉”者,盖以其与《文心雕龙》原本不属于一个重量级之谓也。其实,并非一定要比出一个谁高谁低,更不意味着“让能”“失雉”者便无足轻重,而是说它们的论述范围不同,理论性质有异。所谓“寡二少双”者,乃就“文苑之学”而言也。《文心雕龙》乃是中国古代的“文苑之学”,这个“文”不仅包括“诗”,甚至也涵盖“史”(刘勰分别以《明诗》《史通》《史通》两篇显然是无法与《诗品》《史通》两书相提并论的。章学诚谓《诗品》“思深而意远”,尤其是其“深从六艺溯流别”,这便是刘勰的《明诗》所难以做到的。所以,这里有专论和综论的区别,有刘勰所谓“一隅之解”和“万端之变”(《文心雕龙·知音》)的不同;作为“弥纶群言”(《文心雕龙·序志》)的“文苑之学”,刘勰的《文心雕龙》乃是“寡二少双”的。

令人遗憾的是,当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传入中国之后,我们对《文心雕龙》一书的认识渐渐出现了偏差。鲁迅先生在《题记一篇》有云:“篇章既富,评鹭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这段话论颇类章学诚之说,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肯定

并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与“持人性情”结合,导向对诗的思想性要求。那么,情志又源自哪里呢?刘勰对此前的“感物”说作了改造和微调。比如在陆机那里,感物是“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兴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落脚点在自然节序的变化,而《明诗》篇虽云“人秉七情,应物斯感”,然旋即“物”转到历史和人,这就将诗歌发生论从“感物”引向“缘事”。

从葛天氏《玄鸟》到《三百篇》,《明诗》篇举的都是历史大人物,其功过是非。《玄鸟》是葛天氏《八闾》中的第二首,《载贖》《玄鸟》《遂草木》到《建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葛天氏的八首歌,记叙了上古安民、劳作、祭祀、庆祝完整的生活生产过程。每首诗虽未必都是叙事文本,然具有叙事性,八首前后贯连,则是首尾完整的历史叙事诗。再看后面:“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成怨;顺美匡恶,其来已久矣。”“顺美匡恶”即美刺,美刺固然叙事抒情均可,然将“大禹成功”与“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与“五子成怨”前后相连,就构成事与情的因果关系,事在诗中的根本性地位,不言而喻。

在这里,缘事也包含着叙事。 “九序惟歌”,见《尚书·大禹

和重视,实则仍有不够准确之处。首先,所谓“篇章既富,评鹭遂生”,虽其道理并不错,却显然延续了《四库全书》的思路,把《文心雕龙》列入“诗文评”一类。其次,《文心》与《诗学》的对举恰如《文心》与《诗品》的比较,如果后者的比较不确,则前者的对举自然也就未必尽当。诚然,《诗学》不同于《诗品》,并非诗歌之专论,但相比于《文心雕龙》的论述范围,《诗学》之作仍是需要“让能”的。从而,第三,所谓“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模”,这四句用以评价《文心雕龙》则可,用以论说《诗学》则未免言过其实了。

鲁迅先生之后,传统的“诗文评”演变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心雕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文学理论或文艺学著作。197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在昆明成立,仅从名称便可看出,中国古代文论已然等同于西方的所谓“文学理论”,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文心雕龙》也就成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点研究对象。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上,周扬先生对《文心雕龙》作出了高度评价:“《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一方面是给予了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把《文心雕龙》限定在了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对《文心雕龙》一书性质的认识。显然,较之《文心雕龙》一书的实际,较之刘勰自己的定位,这一认识既非刘咸忻、刘永济等人的子书说,更不是张之象、谭献等明清人的说法了。

实际上,《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以“程器”作结,乃取《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意,前者论述从天地之文到人类之文乃自然之道,以此强调“文”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者论述“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

吊屈原,一方面由于切身的经历和体验,另一方面善于剪裁,“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选择事例精核,成为哀吊文的典范。情感之悲喜哀乐及其浅深真伪,建立在具体人事之上,“情深不诡”以“事信不诞”为基础,相互依恃,方能相得益彰。

情、事的真实,最终都是通过文本体现出来,叙述至关重要。《文心雕龙》总体而言,是论各类文体之写作的。其对叙事传统的贡献,最重要的便是叙述方法、诗文的篇制结构等。因情立体,即体成事,事核言简,文资确切,等等,在文体论、风格论与创作论的相关篇目中,屡次被予以强调。叙述是情深、事信得以达成的技术手段。

从上述简单的梳理可见,事与叙事在《文心雕龙》里的重要地位,是建立在现实性和真实性这两大要素上的。现实性是儒家特别强调的诗歌的重要功能,集中表现在“美刺”与“观风”上。真实性是现实性的前提,又与现实性相互交叉、融合。真实性包含事、情、景等之事实,但最终还是会落实到人、事。二者体现了刘勰论诗重实求真的原则,导源于刘勰崇儒宗经的文学观。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政事哉”,强调“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从而明白无误地说明,刘勰著述《文心雕龙》一书的着眼点在于提高人文修养,以便达成“纬军国”“任栋梁”的人生目标,也就是《原道》所谓“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因此,《文心雕龙》的“文”,比今天所谓“文学”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其地位也重要得多。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序志》篇所说的:“唯文章之用,实经纶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即是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仪节,都离不开这个“文”。如此之“文”,显然不是作为艺术之文学所可范围的了。因此,刘勰固然是在“论文”,《文心雕龙》当然是一部“文论”,却不等于今天的“文学理论”,而是一部中国文化的教科书。我们试读《宗经》篇,刘勰说经典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经”,即恒久之不变之至理、永不磨灭之思想,因为它来自对天地自然以及人事运行规律的考察,“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即深入人的灵魂,代人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它确是一部划时代的书,在文学理论范围内,它是百科全书式的。”一方面是给予了崇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把《文心雕龙》限定在了文学理论的范围之内。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对《文心雕龙》一书性质的认识。显然,较之《文心雕龙》一书的实际,较之刘勰自己的定位,这一认识既非刘咸忻、刘永济等人的子书说,更不是张之象、谭献等明清人的说法了。

实际上,《文心雕龙》以“原道”开篇,以“程器”作结,乃取《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意,前者论述从天地之文到人类之文乃自然之道,以此强调“文”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者论述“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17ZDA253)阶段性成果)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17ZDA253)阶段性成果)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明乎此,新时代的“龙学”和中国文论研究理应有着不同的思路,那就是不应再那么理所当然地以西方文艺学的观念和体系来匡衡中国文论,而是应当更为自觉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以及中国文论的独特话语体系,充分认识《文心雕龙》乃至更多中国文论经典的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心雕龙》汇释及百年‘龙学’学案”(17ZDA253)阶段性成果)

“龙学”在一百年来的发展中渐成显学,可以说有关刘勰《文心雕龙》的方方面面都有学者论及,特别是刘勰论文章创作的内容,不仅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研究重点,同时也在民间最为普及。事实上,作为体大虑周的文论巨典,《文心》犹如大型宝藏,尚有待挖掘的璞玉遗珍,如刘勰在全书中对先秦至南朝近三百位作家的涉及三十多类文体的近四百种文章进行了系统评论,并且评语大多深刻精到,这无疑足唐前文学批评之最,对于我们今天了解唐前文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借作用。

那么,刘勰在评论文章(含诗歌)优劣时,是否具有统一的标准呢?从其具体的评语来看,有一条贯穿全书的重要标准——雅义丽辞。《文心雕龙·征圣》篇倡导向圣人学习文章写作的金科玉律,即“雅丽”:“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衍华佩实者也”,圣人文章既有雅正的内容,又有华丽的文采,华实相配,是所有文章应该效仿的典范。《文心雕龙·论赋》篇提出辞赋创作的要求是“丽辞雅义,符采相胜”,这也是刘勰认为所有文章创作应追求的最高标准。

所谓“雅义”,首先是指文章的内容要有益政治教化,无补时用的作品,是不足取的。刘勰在评论诗、赋、乐府等情感性与文学性强的作品时,就格外看重其政治教化作用,对于含有美刺的《诗经》、古乐府和一些汉魏名赋,充分肯定赞扬。但当这几类作品“以文灭质”,不再具有规补教化的作用时,刘勰就要举起批判的矛头了,如批评只追求文采的赋作是“蔑弃其本,遂使繁华损枝,膏腴散骨,无贵风轨,莫益功戒”(《文心雕龙·论赋》下引自《文心雕龙》只注篇名)。

至于公文笔札,本就是为封建国家政治服务的,内容上有益政教,更是内政之要求。刘勰认为优秀的公文笔札就要有益治道,像西汉贾谊《论积贮疏》、晁错《言兵事疏》、路温舒《尚德缓刑书》、谷永《说成帝拒绝祭祀方术》、陈蕃《谏封赏内充疏》、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王朗《奏宜节省》、温峤《上太子疏请起西池楼观》等汉魏两晋的名奏都是切中时弊,劝诫规讽,都得到刘勰的赞赏。

在评价一些民间文体时,刘勰也是以内容是否有益政教来置褒贬。比如“谐词”和“隐语”起于民间,是老百姓为了表达内心的“怨怒之情”,而创作出的嘲笑和暗讽的话,对统治者有一定箴戒作用,但到汉魏以后,渐渐发展成为仅供娱乐的笑话和谜语了。刘勰对此的评价态度十分明确,古之谐隐不可废,但今之谐隐则无足取。以“谐词”为例,战国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来讽谏楚襄王不要沉迷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谐隐》)。但到了魏晋时期,讲滑稽笑话的风气盛行,曹丕甚至专门编成《笑书》,潘岳创作《丑妇》,束皙写成《卖饼》,这些就“曾是誇言,有亏德音”(《谐隐》),完全是调笑之作,对政治教化没有丝毫用处。

另外,“雅义”还要求文章内容要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不能弃孝废仁,违礼反道。刘勰指责法家的作品《商君书》《韩非子》“弃孝废仁,轘药之祸,非虚至哉!”(《诸子》)“废弃儒家仁孝,无怪乎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毒杀了。还有左思的《七讽》因为‘说孝而不从’不遵从儒家孝道,刘勰便以此全盘否定了整个作品,明言“反道若斯,除不足观矣”(《指瑕》)。最明显的例证是《史传》篇激烈地抨击班固、司马迁将吕后列入记载皇帝事迹的“本纪”中,刘勰认为这是“违经失实”,儒家向来排斥女人干政,即使实际皇后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是不能写入帝王本纪里的治体。

至于“丽辞”的标准,刘勰是要求文章讲究语言修辞之美,要求声律和谐、结构严谨,特别是充分运用对偶、比兴、夸张、用典等艺术手法,体现出艺术性和审美性。另外,刘勰还对文辞表达的繁、约、显、隐有所要求,他特别青睐“简约”和“显物”的文章。《铭箴》赞曰:“文典则弘,文约为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雅义丽辞

刘勰评论文章的标准

□ 李靖

《议对》中说:“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文约为美”实是刘勰在全书中广泛应用的一项评文标准。例如,他称赞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杂文》);“《议对》”凡此种,不一而足,皆是赞扬这些作品为文精简,简要得当。与之相应,刘勰明显批评文辞繁杂之作,像:冯衍之铭“铭略违中”(《铭箴》);温峤《侍臣箴》“博而患繁”(《铭箴》);冯衍论说“事信文繁”(《论说》);傅咸议对“属辞枝繁”(《议对》)这些也都是作品不足之处。然治禁总要并非易事,一些博学才颖的大家也难免繁辞之弊,如西晋文豪陆机,刘勰多次指出他的这一缺点:《哀吊》中批其《吊魏武帝文》“序巧而文繁”;《议对》中批其“亦有锋颖”,而“辞弗剪,颇累文骨”;《熔裁》中说“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体性》指出“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最后在《才略》中对陆机的总结就是“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入巧而不制繁”。

刘勰还应用了事显为贵的标准。如他要求“议对”这种文体要“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议对》),论事以明白核实为美,不能深幽隐晦。像公孙弘的《举贤对策》“事切而情举”(《议对》)论事确切而情意明显,无怪乎被汉武帝拔擢为第一名。无独有偶,用于军事行动上征讨敌人的战斗檄文,刘勰认为“必事理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要起到宣传震慑的效果,必须把事理写得清楚明白、气势旺盛文辞果断,如魏器之《檄亡新》“意切事明,陇右士闻,得微之体矣”(《檄移》)!

刘勰“雅义丽辞”的评论文章标准,体现了六朝时期对语言艺术之美的追求,有领先时代之处,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儒家诗教观,有其局限保守的地方。我们今天在参考借鉴时,要予以充分辨别,去粗取精,才能正确利用这一宝藏。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学遗产